

鄂豫皖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方式的实践探索

韩 煦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英大传媒集团,北京 100005)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鼓舞士气,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形成了以各类报刊为载体的组织宣传,以革命歌谣和标语口号为媒介的大众化宣传,以新剧团、俱乐部等为依托的文艺宣传,以培训班和学校为阵地的教育宣传的样态。但也存在着如教条主义、脱离群众、方式方法简单落后等一些问题。鄂豫皖苏区时期党在宣传方式上的创新与失误,是党在宣传工作上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关键词:宣传工作;鄂豫皖苏区;中国共产党

OSID: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2)05-0125-06

宣传工作作为舆论宣传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青睐与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是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宣传工作就是围绕中心工作诠释、宣传这一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鼓舞士气。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鼓舞士气,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形成了以各类报刊为载体的组织宣传,以革命歌谣和标语口号为媒介的大众化宣传,以新剧团、俱乐部为依托的文艺宣传,以培训班和学校为阵地的教育宣传等样态。

一、以报刊为载体的组织化宣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为了提升宣传效果,在宣传方式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对党成立初期的宣传方式做了明确规定,“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1]192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规定:一是尽可能地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的

党报;二是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三是尽量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但须切实审查给予正确的指导;四是建立秘密发行路线,扩大推销党的机关报于广大群众中间;五是设立工人学校读书班等以接近影响工人群众,开展识字运动……^{[2]11-12}。这些政策、决议规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形式与方法。

在鄂豫皖苏区,宣传的重要手段就是报刊的创办与发行。当时,从中共鄂豫皖分局、省苏维埃政府、军委会及群团组织到特委和县级党政群团组织均创办了各级各类报刊,产生了较大反响。1929年3月12日在《鄂东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组织、宣传及工作布置对中央的请求》中提到“黄安县委编辑出版刊物《群众》,已出三期,每版六百册。用民众化的方式编辑,农民颇欢迎,效力很大”^{[3]228}。

鄂豫皖苏区所创办的报刊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党、政、军、群等几类。一是各级党组织创办的刊物。比如,1928年初中共黄安县委创办了《群众》半月刊;1928年7月中共麻城县委创办了《战斗》;1928年中共孝感县委创办了《火线》;1929年春中共鄂东特委创办了《英特那雄纳尔》;1930年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创办了《我们的路线》;1931年初中共鄂豫皖

收稿日期:2022-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VPX021)

作者简介:韩煦(1992—),女,河南罗山人,编辑,主要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边特委创办了《工农兵》(后来更名《苏维埃》)和《党内生活》;1931年夏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创办了《列宁三日刊》《赤色儿童》;1931年中共皖西北特委创办了《火花》半月刊和《红旗》双月刊;1931年中共商城县委创办了《咆哮》月刊和《红日》画报。二是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刊物。比如,1931年5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列宁周报》《红色战士》《苏维埃周报》《苏维埃三日刊》;同时鄂豫皖根据地各县苏维埃政府均创办了《捷报》。三是军事机构创办的刊物。比如,1931年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创办了《红军战士》;1931年红四军政治部创办了《红军党的生活》和《红军生活》;1931年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创办了《消息汇报》;中共红四军党务委员会创办了《红军周刊》。四是群团组织创办的刊物。比如,1931年鄂豫皖团中央分局创办了《少年先锋报》《赤色儿童报》;1931年7月皖西北共青团创办了《赤色先锋》;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当时还办有《卢森堡》、鄂豫皖特区总工会创办有《工人周报》等刊物。这些报刊主要刊登鄂豫皖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决议、通令、政治消息、国内外大事、战况等内容,也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的宣传介绍,此外还有一些结合革命斗争生活创作的文艺作品。

此外,在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初期,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知识分子还创办了“商城书社”“三民书店”等传播进步思想的机构,这些机构出版发行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这也是党在鄂豫皖从事宣传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以革命歌谣为媒介的口头宣传

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民众的实际情况和早期的实践经验,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启蒙、动员群众的宣传策略,其中特色最为鲜明的就是革命歌谣。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利用当地民歌的韵调、形式融入革命内容而创编的革命歌谣深受群众欢迎。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指出,宣传党的政策要“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4]421},后来特别强调要“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4]619}。“我们需要运用一切旧的技巧,那些为大众所能通晓的一切技巧,作我们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形式就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5]223}。这种尝试为各个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鄂豫皖苏区地处大别山区,因受中原文化、楚文

化、吴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此地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民歌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为当地广大民众所喜爱。为了宣传革命、鼓舞士气、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党的宣传工作者和进步的民间艺人,充分利用大别山民歌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资源,结合现实斗争生活实际,编创了大量的革命歌谣。其内容有反映革命暴动的、有反映反“围剿”的、有扩红支前的、有战前动员的、有庆祝胜利的。比如,《黄安谣》原是清咸丰年间黄安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时流行的歌谣:“小小黄安,实在难缠。铜锣一响,四十八万。”1927年“黄麻起义”攻克黄安城后,党的宣传工作对原来旧的《黄安谣》词曲进行了改编:“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6]1}歌词简单一改,新意全出。洋溢着起义军的战斗精神和豪情壮志。再如,黄麻起义时还创作了《暴动歌》:“反对统治,我们要推翻!土豪劣绅,我们要杀完!工农们,齐暴动,实现共产,同把身翻。”^{[6]39}

1929年9月8日《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鄂东北特区最近以来工作概况》总结道:“从经验中歌谣的宣传效率最大,因为各种文字宣传识字者最少,意义又深,又少味,农民最喜欢唱歌。现在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尽唱革命歌,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所编的歌甚多,大都是有农民自己或区委、支部等下级同志编成,他们来得很自然,或者中间意义词句稍有错误,经上级同志修改过,但是上级同志(尤其宣传负责同志)没有编出来一个。歌中最著名的收效最大普遍传布在黄安、麻城、光山、黄陂的是《十二月穷人歌》《枪会革命歌》《兵变歌》,随时随地都听见这革命的歌声,甚至白色区域里的妇女、小孩也自然无顾虑地歌(唱)出来。”^{[7]360-361}作为鄂豫皖边特委宣传部长何玉琳,把鄂豫皖苏区利用歌谣进行宣传工作的情况和效果总结得非常到位,也很真实。因为革命歌谣采用当地方言口语、民歌调,通俗易懂,情真意切,充满生活气息,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鄂豫皖苏区宣传鼓动工作主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人数少,红军队伍比较弱小,根据地经济条件落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围剿”,生存是第一要务,“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所有的宣传服务于军事斗争工作。每当有战斗发生或者战斗胜利后,党政军各级宣传部门就会组织相应的宣传活动进行鼓舞或庆祝。1929年商城起义胜利后,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当地民间艺人王霁初采用大别山民歌《八段锦》曲调创作了

《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八月桂花遍地开》)。其内容“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形象地反映了工农红军的豪迈、喜悦的心情。“当时的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内,每当打土豪、分田地、打仗、生产、扩大红军等,都要唱几首山歌,或演一出戏进行宣传鼓动”^{[8]18}。在扩红运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也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革命民歌,如《送郎投红军》:“早起开柴门,红日往上升,今天送郎投红军,小妹喜在心。”

据光山县老红军易继明所讲:“这些大别山歌谣,曲子多是当地流行的山歌、车水歌、薅秧歌等民间小调,填上带有革命内容的新词,就成了一支歌,唱起来顺口,又好记。”红色歌谣主要采用“旧瓶装新酒”、地方方言与革命话语融合的形式。革命歌谣在当时流传广泛,对民众动员作用巨大。

三、以标语口号为依托的大众化宣传

标语口号既是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内容的高度提炼,又是党组织发动群众最简便、最直接有效的宣传手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各根据地党组织,都高度重视标语口号的宣传作用。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深刻认识到“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形成伟大的斗争的力量”^[2]。为此,制定了“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工农子弟都来当红军”“紧急动员起来,努力扩大红军”等情真意切的红色标语宣传。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明确指出:“一切我们党与苏维埃的口号,我们的政策,必须是有大多数工农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这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目的。”^{[9]220}

1931年5月25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六号的文件中指出:“为配合红四军向南行动,须迅速有大规模的宣传及口头演讲做文字宣传等,须以此口号为根据,同时须广大散发,尤其是要大画在墙上,此事非常紧要。接到这些口号,立即有计划的发动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去工作。”^{[10]170-171}并且明确提出了28条标语口号,如“工农群众一致的起来,帮助红军打胜仗!”“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色区域的群众,你们要想不受痛苦,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

标语口号主要是以壁报、传单、布告等形式呈现的,标语口号充分体现苏区的中心工作。在鄂豫皖苏区创立、发展、巩固的不同阶段,其任务侧重点不

同,标语口号也随之变化。在根据地初创阶段,党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着武装暴动、土地革命等内容展开。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杀尽豪绅地主”“实行土地革命”“暴动没收一切田产”“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等口号。在根据地发展巩固阶段,党的中心工作是反“围剿”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提出“不荒芜一寸土地”“增加生产多打粮,支援红军打胜仗”“工农兵政权万岁!”等口号。在保卫根据地阶段,主要是1932年至1934年,当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疯狂“围剿”,使根据地建设面临严重困难,中共提出“与土地共存亡”“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巩固赤南中心苏区”等口号^[11],号召民众共同保卫根据地。

此外,漫画也在当时宣传中起到一定作用。漫画以简单的笔画线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描绘着当时苏区的斗争生活。由于漫画就地取材,手法简单、明了,内容直观、鲜明,观赏性强,且老少皆宜,宣传效果较好。在当时的苏区各村镇的墙壁上、路边石崖上都有许多宣传漫画,如现在依然保留着的《打倒帝国主义》《活捉岳维俊》等漫画。

四、以新剧团、俱乐部等为平台的文艺宣传

文艺演出在鄂豫皖苏区是深受广大军民欢迎的宣传活动中之一。党的各级宣传机构充分动员各种文艺力量进行革命宣传。一般在重大节日、群众集会、庆功动员、军民联欢时都要组织群众演出和新剧团文艺演出活动,所演节目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民歌、舞蹈。在鄂豫皖苏区各级政府组建了众多的新剧团,主要以话剧演出为主,还有采茶歌、皮影戏、花鼓戏、黄梅戏等^[12]。内容多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的罪行,歌颂红军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反映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如《地主收租》《共产党进城》《独山暴动》《仇恨》等。在这些众多的文艺剧团中,“红日剧团”和“三壁湾音乐队”最有影响。

“红日剧团”起源于1929年商城起义后建立的工农政权所创办的“红日报社”。1930年初“红日报社”组建了“红日剧团”,王霁初任团长。王霁初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先后创作了《穷人调》《十二月宣传歌》《送郎当红军》《兵变歌》等革命歌曲和新剧目。1932年,“红日剧团”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征,在红军队伍里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红日剧团”不仅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文艺宣传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文艺骨干。

“三壁湾音乐队”由光山弦南区第三乡三壁湾村

张姓户族的吹打乐班组成。原吹打乐班有200多年的历史,在第4代传人张锡泉带领下参与了苏区革命文艺宣传活动,足迹遍布红安、麻城、光山及新集周边地区,经常演奏《八月桂花遍地开》《穷人调》等。1931年后“三壁湾音乐队”成为边区政府音乐队,后来有一部分随军长征,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一批军乐队员。其中最主要的9名队员中有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俱乐部是苏区各级政府机关、军队和单位团体的重要文化娱乐机构,也是苏区最具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娱乐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俱乐部纲要》规定了俱乐部的宗旨是“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学识,以发扬革命情绪,从事文化革命”。苏维埃各级政府都建有俱乐部,基层乡村建立列宁室;军队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俱乐部下设晚会、艺术、墙报、体育、文化委员会,俱乐部领导各列宁室的工作。列宁室设有干事会,下设讲演、游艺、体育、识字、墙报和青年等活动小组。俱乐部作为自我教育的组织,通过娱乐活动进行政治文化教育^[12]。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文化教育政策10条,其中明确规定“大力发展和建立俱乐部、游艺场以及美术、戏剧、化装、讲演等工作”。当时中央苏区的《红旗》刊登描述苏区俱乐部情况的文章:“每晚有人作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全乡老幼男女每晚相聚一堂,欢呼高歌,真是十分热闹。”俱乐部不仅成为苏区城乡的文化活动中心,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而且成为苏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中心,在娱乐和知识学习过程中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13]139}。

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为广大苏区军民所喜爱,起到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宣传效果非常显著。

五、以学校和培训班为阵地的教育宣传

鄂豫皖苏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与培训班也肩负着宣传鼓动工作。鄂豫皖苏区学校与培训班主要有红军学校、干部培训学校、社会教育学校、普通学校。在苏区教育宣传中成效较为显著的是干部教育和普通教育。苏区干部教育规模最大的是新集列宁高级学校。该校于1931年初在郭家河(现新县郭家河乡)创办,后迁到新集镇(现新县新集镇),存续16个月。杜孝生任校长,教师有秦指南、方乾寿、郑仲、戴雪舫、曹正用、肖永银等。招生对象是干部子弟、红军子弟和优秀的贫苦农民子弟,大多为党、团员,年

龄一般在16至20岁之间。培训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军事知识教育、文化知识学习等。列宁高级学校为红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300多名优秀干部。

当时,鄂豫皖苏区普通教育比较规范。普通教育主要包括师范班和各类列宁小学。师范班于1930年创办,由郑位三领导,成仿吾具体负责,学员由各级党政机关保送,条件是具有高小文化水平、阶级成分好、历史清白的青年。授课教师由当时鄂豫皖苏区党政领导担任,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国语、算术、历史等,如当时的红军师政委张琴秋负责讲政治常识,主要结合现实斗争情况讲授革命道理、国内外政治形势。

列宁小学包括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模范小学等几类。在鄂豫皖苏区各级各类列宁小学有4000多所,列宁小学的具体任务就是提高少年儿童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认识。比如,《列宁初级小学校国语教科书》(第一册):“一、人,大人,小孩。二、你是人,我是人,他也是人。三、你是工人,我是农人,他是红军。……十三、我家三口人,分得六斗田,爸爸妈妈很喜欢。……二十三、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二十八、童子团,小宝宝,要读书,要习字,要站岗,要放哨。……三十四、节省粮食,拥护红军,红军家属,我们时常要去慰问。……”从课本内容可以看出,教材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向少年儿童灌输革命内容、讲述革命道理、培养革命意志,不仅具有现实革命要求的迫切性,而且还具有为革命留下火种、培养接班人的长远性。此外,列宁小学开展的课外活动主要有:一是配合赤卫队站岗放哨;二是组织宣传队广播重大新闻,发送报刊,宣讲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以及各项中心工作任务;三是编演新剧目,教唱革命歌曲^{[14]65}。从这些课外活动的内容可以看出列宁小学发动少年儿童参与宣传鼓动工作是重中之重。

这些教育机构不仅仅识字扫盲、学习文化知识,而且通过教师讲授、课文内容取舍等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和培训班为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群团组织培养了一批批具有良好理论素养、较高政治觉悟的骨干,很多人后来成为专门从事宣传工作人员。

六、宣传方式探索的经验与教训

鄂豫皖苏区时期党的宣传工作者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增强宣传的针对性,提高宣传的实效性,对宣传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宣传形式上不仅有意识地进行宣传话语方式的转化,而且借用当地传统民间文化资源,将其进行有意识的革命化改编,变为根据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且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形成了以报刊、书籍为载体的组织化宣传,以标语口号、歌谣、戏曲、歌舞等为媒介的大众化的文艺宣传,以学校、培训班为载体的教育宣传等样态。

鄂豫皖苏区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方式的创新经验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话语的大众化转化,使宣传内容易懂易记易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理论色彩较浓,内容抽象,如何将抽象、难懂的革命理论转化为具体的、通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1929年6月党中央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的认识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2]45-46}要想使宣传内容为群众所接受、掌握,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要符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就应实现宣传工作话语系统的转化。

二是贴近生活,把宣传内容渗透到军民的生产生活中。党的方针、政策等是基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所提出来的,其本质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内容,宣传工作应从广大群众最关切、最想改变的现实生活入手。比如,农民最热切盼望耕者有其田,党在苏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宣传鼓动工作,以回应广大群众的关切。又如,识字运动,当时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基本上处在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饱受不识字被剥削、被愚弄的痛苦,所以苏区开展轰轰烈烈的识字扫盲宣传工作,就是希望改变他们睁眼瞎的现状,让他们明白事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再如,把扩红运动与拥军优属、春耕秋收相结合的宣传运动。

三是宣传活动文艺化。鄂豫皖苏区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尤其是民间歌谣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党的宣传工作者采取“旧瓶装新酒”或吸收、改造当地方言土语的方式创作出了大量的革命歌谣。通过文艺演出、演讲、戏剧、歌谣、音乐、舞蹈、漫画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适合文化程度低、识字少的劳苦大众,效果非常明显。

总之,在鄂豫皖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上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不仅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苏维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而且围绕军事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扩红运动、动员群众支援前线等宣传

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在当时的作用:一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二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三是有力支援了苏区的反“围剿”军事斗争。

但是,鄂豫皖苏区党的宣传工作也有一些教训,如极端“左”倾主义、脱离群众,方式简单落后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左”倾思想错误指导,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对党的宣传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极端“左”倾主义的思潮,一直困扰着党的早期发展,也使党的各项工作出现挫折。当时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淘汰异己分子》一文中说:“淘汰党内异己分子是党所经常应该注意的工作。什么是党内异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真正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口头上学会了假革命的话,实际对于革命是站在旁观的地位……要把异己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才能够保持党的一致,才能使革命成功。”^{[15]432}当时的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到来之后,“肃反”越来越猛烈。由于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存在某种政治偏见,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方式简单粗暴,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党领导群众的文化水平,进而影响了宣传质量的提高。

二是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脱离群众。在宣传内容与方式上过分强调师从苏俄,生搬硬套,没有很好地进行中国化的消化和理解,宣传效果不好。苏俄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者极大鼓舞,苏联共产党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中国国情与苏俄差别巨大,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对苏俄盲目崇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知半解,在宣传方式上生搬硬套,空喊口号,以致出现很多工农群众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东西的现象。没有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化,脱离群众,教条主义严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现很多挫折。

三是宣传手段简单、内容单一,宣传队伍不规范。在早期的革命中,由于认识局限、经验不足,在宣传鼓动工作上,存在宣传内容过于单一、手段过于简单的一些问题。正如沈泽民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上所说:“以往的宣传工作,可说是简单到极点,除了几个大纪念节发言宣传大纲外,平时的宣传,只限于墙上贴几张标语,内容是些‘打到改组派’‘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千篇一律,与当前政治任务相去万里的话。”^{[16]232-233}同时,当时鄂豫皖苏区的宣

传组织体系虽然完备,但专业的宣传员不仅少而且成分杂,素质参差不齐。由于鄂豫皖苏区一直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生存变成第一要务,普遍重视一线战斗人员,宣传队处于次要地位,老弱病残人员较多,有许多是俘虏兵、伤残人员甚至还有伙夫马夫等,其宣传效果可想而知。

鄂豫皖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宣传工作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G]//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 [2] 严帆,廖巧云. 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G]//《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 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 [3] 鄂东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组织、宣传及工作布置对中央的请求[G]//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 [4] 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G]//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5] 汪木兰,邓家琪. 苏区文艺运动资料[G].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6] 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 红安革命歌谣选[C].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 [7] 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鄂东北特区最近以来工作概况

[G]//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 [8] 刘云. 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 [9] 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G]//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1931).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G].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 [11] 郑段. 鄂豫皖根据地革命口号研究[J]. 三明学院学报,2018(3):49-55.
- [12] 韩大强. 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文艺特征比较研究[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1):127-134.
- [13] 严帆. 中央苏区创办的大众文化娱乐机构:俱乐部[G]//《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 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 [14] 邹荣. 鄂豫皖苏区文化动员与意识形态建构:1920—1937:[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15] 沈泽民. 淘汰异己分子[G]//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 [16] 沈泽民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皖西北的工作(1931年5月23日)[G]//《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Modes in Hubei-Henan-Anhui Soviet Area Period

HAN Xu

(Yingda Media Group, State Grid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der to publicize the Party's policies, mobilize the masses and encourage moral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when establishing Hubei-Henan-Anhui revolutionary base. The CPC practiced and explored various forms of propaganda such as organizational propaganda with vario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s the carrier, mass propaganda with revolutionary ballads and slogans as the media,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paganda with new troupes and clubs as the support, and educational propaganda with training classes and schools as the main body.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dogmatism, detachment from the masses, simple and backward ways. The innovation and errors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forms in that period are not only beneficia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lessons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later Party's propaganda work.

Key words: propaganda; Hubei-Henan-Anhui Soviet A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编辑:吉家友)